

傅玄《魏书》蠡考

李 晓 明

西晋著名学者傅玄对三国史的研究,体现在其所撰的《魏书》及其对三国历史的评论上。但长期以来,由于这部书可能未完稿且又亡佚,以至人们对其参撰魏史的活动或有所提及,而对其所撰《魏书》尚部分存世的事实却未予关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版的各种中国史学史专著和教材中,没有一部论及傅玄与《魏书》详细关系的。一些研究傅玄的综述性的文章和专门研究傅玄史学的文章,也多是论述傅玄的各类思想,未涉及到傅玄与《魏书》的关系,或用了有关傅玄的史料而不明白这些史料性质的归属,或误把这些材料认为是傅玄的政论作品或文学作品中的材料^①。最能代表现代史学界认识的是《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该书“傅玄”条说:“在曹魏时曾选入著作,与王沈、孙该等共撰《魏书》。”而在同书的“魏书”条中,所列举的《魏书》共两部,一是西晋王沈所撰,一是北齐魏收所撰^②。傅玄与《魏书》的关系被完全忽略了。笔者认为有必要厘清这一问题。

《魏书》,可能是部不完整的国史著作。我们从陈寿《三国志》中可知,魏晋之际撰著魏史并名《魏书》者实际上有三部,一是傅玄的《魏书》,二是陈寿的《三国志·魏书》,三是王沈与荀詡、阮籍共同撰写的《魏书》。王沈等人的《魏书》修撰水平不高,问世不久就遭非议,臧荣绪《晋书》即言其“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③。至唐代的刘知几仍秉承臧氏的这一观点,他在总结魏史撰写的过程时说:

魏史,黄初、太和中始命尚书卫觊、缪袭草创纪传,累载不成。又命侍中韦诞、应璩,秘书监王沈,大将军从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长史孙该,司隶

①参刘治立《傅玄及其史学》(《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2期);王记录《傅玄史学思想钩沉》(《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辛志凤《傅玄及其〈傅子〉研究简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6期)。

②分见《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460、506页。笔者按:此两条材料,前者依据的是下面引文中的刘知几《史通》中的观点,后者显然是忽略了傅玄曾撰《魏书》的事实。

③臧荣绪:《晋书》卷7,《九家旧晋书辑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

校尉傅玄等,复共撰定。其后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①

这段话给人的印象也是傅玄的魏史撰著没有完成,其成果已经包含在王沈的《魏书》中了。此书在历史上流传了相当一段时间,《隋书·经籍志二》载王沈《魏书》四十八卷,同名书只此一部,而没有傅玄的《魏书》,于是傅玄《魏书》曾存世的事实更加湮没在历史的烟海中了。实际上《晋书·王沈传》记载他“与荀顗、阮籍共撰《魏书》”,《傅玄本传》中则记载傅玄“与东海缪施(笔者按:不是刘知几所说的“缪袭”)俱以时誉选入著作,撰集《魏书》”。这些史料既没有反映出二者是先后的关系,更不是“王沈独就其业”。

通常人们所了解的傅玄著作,一是《傅子》,二是《傅玄集》。《傅子》言治道政体、“存重儒教”,依传统古籍分类来看,属子部书;《傅玄集》收集的是赋、诗、箴、铭、奏等,则属集部。既如此,那么,其记述和论述历史的这一部分尤其是魏史的这一部分内容,就有可能是他所撰的《魏书》。

笔者试从以下几个问题入手,探究傅玄《魏书》存在与否及其基本概貌。

一、《三国志注》所引“傅子曰”所指为何

依《晋书·傅玄传》,除《傅玄集》外,《傅子》是以“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为主要内容,读过《傅子》部分内容的王沈曾给傅玄写信赞美此书:“省足下所著书,言富理济,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杨、墨之流遁,齐孙、孟于往代。每开卷,未尝不叹息也。‘不见贾生,自以过之,乃今不及’,信矣!”^②这些都表明了《傅子》的内容特征。“论经国九流”的特征较易区别,现行收入《傅子》辑本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属于此类。关键的和易混淆的、也是与历史相关的,应该是论“三史故事”的部分。何谓“三史”?清人钱大昕对“三史”的定义及其沿革曾经做过较为细致的研究。他以《后汉书·郡国志》、《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注引《江表传》及《孙峻传》注引《吴书·留赞传》、《晋书·傅玄传》、《隋书·经籍志》所录之吴太子太傅张温所撰“《三史略》”等为例,指出:“三史谓《史记》、《汉书》及《东观记》也……自唐以来,《东观记》失传,乃以范蔚宗书当三史之一。”^③就是说傅玄时代的“三史”是指这三部史书。明确此标准与特征,我们就完全可以认定,传世傅玄的文献或现行各种《傅子》辑本中,那些记述和评论三国历史的文字,其实与《傅子》无涉。

其次,“傅子”作为一个词,本来既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书,但对于傅玄,则基本是指人而非书。之所以人们曾经认为也指书,原因是历来对傅玄的《傅子》较为熟悉,而对其《魏书》则知之甚少,加之裴注中的引文又多是以书名起

①《史通》卷12,《古今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46页。

②《晋书》卷47《傅玄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23页。

③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6“三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19页。

首(当然也不乏以人名起首的例子,如有“孙盛曰”、“鱼豢曰”之类),所以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既成事实:“傅子曰”就是“《傅子》”。然而,在傅玄时代,对人称“子”是普遍的尊称。如《三国志·杜夔传》裴注引傅玄为扶风马钧所写的传记,提及高堂隆与秦朗,称之为“二子”,并多次称裴秀为“裴子”,而自称为“傅子”^①。显见“傅子”也曾是傅玄生前的自称,而称“傅子”也就是称其人。

另一个“傅子”与“傅玄”互为替换的例子是,在《三国志》裴注引“傅子曰”言及汉末的服饰时尚:“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帡,合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于今施行,可谓军容,非国容也。”^②此文在沈约的《宋书》中也有引用:“魏武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始拟古皮弁,裁缣帛为白帡,以易旧服。傅玄曰:白乃军容,非国容也。”^③此文又见于《晋书》卷27《五行志》上,其亦作“傅玄”。

另外,傅玄以其曾掌礼仪,发表过很多的见解。这些见解最初的出处我们不得而知,但笔者归纳统计发现,其议论对象基本上集中在涉及三国历史的这一段,它们的一个中心内容都是关于礼仪舆服的,而后人在徵引他的观点时,或曰“傅玄”,或曰“傅子”,或曰“傅玄子”,如:“远游冠,傅玄云秦冠也。”^④“尚书何晏好服妇人之服,傅玄曰:‘此妖服也。’”^⑤“傅子曰:侍中冠武弁”^⑥。又“傅子曰:汉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豹)[崔钩]之徒,虽为将帅,皆著缣巾。”^⑦同样的内容在《宋书》中作:“傅玄子曰:‘汉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钩之徒,虽为将帅,皆著缣巾。’”^⑧同卷又曰:“傅玄子有:‘夏曰余车,殷曰胡奴,周曰辎车。’”^⑨笔者认为,以上各书所称“傅子”更多的是指人名而不是书名。此外,与傅玄同时代的学者挚虞在其文论中曾说过:“傅子集古今七而论品之,署曰《七林》。”^⑩显然这里的“傅子”也同样是称人而非称书。

二、“傅子曰”与王沈《魏书》的并存关系

《三国志注》中的“傅子曰”,与其他的魏史实际上是一种并存的关系。这

①《三国志》卷29《杜夔传》裴注引,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07-808页。

②《三国志》卷1《武帝纪》裴注引,第54页。

③《宋书》卷30《五行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86页。

④《晋书》卷25《舆服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66页。

⑤《晋书》卷27《五行志上》,第822页。

⑥《文选》卷37曹子建《求通亲亲表》李善注引,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21页。

⑦《三国志》卷1《武帝纪》裴注引,第54页。

⑧《宋书》卷18《礼志五》,第520页。

⑨同上,第497页。

⑩欧阳询:《艺文类聚》卷57引挚虞《文章流别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0页。

一点我们在考察裴注的注释规律和注释内容时,就可以明显地看出。

在对待刘备投奔曹操的问题上,王沈的《魏书》记载为,刘备投奔曹操之后,曹操任命其为豫州牧,有人对曹操说“备有英雄志,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曹操徵询郭嘉的看法,郭嘉承认这个看法有道理,但他同时又认为,刘备有“英雄名”,这个时候来投奔,如果杀了他会有“害贤”之名,“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曹操听从了他的意见。而“傅子曰”与此记载相反,是郭嘉主动向曹操建言,认为“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宜早为之所”,并在此后又与程昱一再劝谏曹操动手。但当时的曹操“方招怀英雄以明大信,未得从嘉谋”。后刘备举兵叛逃,曹操因此很后悔没有听从郭嘉的建议^①。陈寿对这件事没有记述,裴注将两种不同的记载并列于此,也是两说并存的处置方法,而这恰恰也告诉我们,傅玄所记载的魏史与王沈所记载的魏史是并存的关系,并不存在一者代替另一者的情况。如果傅玄的《魏书》被王沈的《魏书》吸收了的话,就不该出现这种矛盾的说法。

据笔者统计,在共计六十五卷的《三国志》中,“傅玄曰”和王沈《魏书》同时出现在同一卷中的现象有十七处。在这些地方,傅玄和王沈对历史事实的记载,或互为补充,或互为存疑。而且裴注徵引二者主要集中在卷一至三十的《三国志·魏书》部分,所引“傅子曰”的54条中这部分占了50条,所引王沈《魏书》的182条中这部分占了169条。这些现象都说明,二者的内容均集中在魏史,它们在内容上是互相不可替代的,在著作形式上是并行的。

三、“傅子曰”所反映的傅玄《魏书》概貌

裴注所引“傅子曰”尽管只是傅玄研究三国历史特别是魏史的一小部分资料,但也包含着大量的信息,使我们得以窥见其所具备的史书特质。

1. “傅子曰”中体现了史学著作的一般特征。

《三国志·刘表传》中有东曹掾傅巽劝刘琮降曹操一节,裴注在补充材料时引用了“傅子曰”:

巽字公悌,瓌伟博达,有知人鉴。辟公府,拜尚书郎,后客荆州,以说刘琮之功,赐爵关内侯。文帝时为侍中,太和中卒。巽在荆州,目庞统为半英雄,证裴潜终以清行显;统遂附刘备,见待次于诸葛亮,潜位至尚书令,并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讽以才智闻,巽谓之必反,卒如其言。巽弟子嘏,别有传。^②

这段文字至少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这是一段较为详细的傅巽的传记资料,在细节、完整性、连续性和记事的特色上,远胜于陈寿原书;第二,从其末句“巽弟子嘏,别有传”可以看出,傅玄的书中,在人物传记方面是利用了史书传

^①《三国志》卷14《郭嘉传》裴注引,第433页。

^②《三国志》卷6《刘表传》裴注引,第214页。

统中的“互见法”的。并且他对傅巽的记述也绝不会是特殊之例,在他的书中应该有很多的人物传记存在。如《三国志·郭嘉传》中的裴注所引“傅子曰”云:

太祖欲速征刘备,议者惧军出,袁绍击其后,进不得战而退失所据。语在《武纪》。太祖疑,以问嘉。嘉劝太祖曰:……^①

傅玄在这里用了互见法,也使我们知道他所著的《魏书》是有《武帝纪》的,或者说是有“帝纪”的。恰巧在此注文之后,裴松之又下了自己的按语:

臣松之案《武纪》,决计征备,量绍不出,皆出自太祖。此云用嘉计,则为不同。^②

看来裴松之根据“傅子”提示的线索,检核了《武纪》中的记载,发现两处的说法略有不同。这可能恰好是傅玄对于史书互见法的妙用:在《武纪》里注重夸奖曹操的功业,在《郭嘉传》里则说明此谋略出自郭嘉。

这些说明:此处的“傅子曰”是一部历史书中的人物传的一部分,而不应当是离事以言理的政论性的《傅子》的一部分。此外,为丰富陈寿所记刘表死后刘琮的降魏细节,裴松之除引用了“傅子曰”,还徵引了《汉晋春秋》和《搜神记》等,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傅子曰”和这些书一样,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记述了东汉末年到魏的这段历史。与此相似,裴注徵引“傅子曰”的其他文字也多如此,可以说在裴注所引“傅子曰”中,应该不是政论性著作《傅子》中的文字。

“傅子曰”中的一些痕迹显示了其作为历史书的若干原始面貌。如《三国志·曹仁传》中“黄初四年薨,谥曰忠侯”,裴注引《魏书》:“仁时年五十六。”同时又徵引“傅子曰”:“曹大司马之勇,赍、育弗加也。张辽其次焉。”^③裴注中的《魏书》应该是指王沈的《魏书》,这是又一处王沈的文字和傅玄的文字同时出现的例子。从裴氏所出注的位置和所引二文的内容性质来看,所徵引的文字出现在这里是最为恰当不过的了,也只能因为其性质相同才会如此。换句话说,两处引文应当是引自两书中的相对应的文字,即两书中的《曹仁传》,甚至可以更为具体地说,是位于传末的文字。文中的“傅子曰”是典型对人物死后总评性质的文字,傅玄主要称赞其勇,并与张辽做了对比,这与《三国志》中对曹仁记述的主旨是一致的。

2.“傅子曰”保存了对同时代人与事的记述,体现了中国史学记述的优良传统。

尽可能地利用作者自己的亲眼所见和采访材料,这是自司马迁以来历史

①《三国志》卷14《郭嘉传》裴注引,第433页。

②《三国志》卷14《郭嘉传》裴注引,第434页。

③《三国志》卷9《曹仁传》裴注引,第276页。

著作的优良传统,我们在裴注的“傅子曰”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三国志·管宁传》提到了“善史书”的社会名流胡昭,裴注引“傅子曰”:
“胡徵君怡怡无不爱也,虽仆隶,必加礼焉。外同乎俗,内秉纯洁,心非其好,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于书籍者,吾于胡徵君见之矣。”^①胡昭卒于魏嘉平二年(250),享年八十九,此年傅玄三十五岁,他对胡昭的评价应该是相对比较准确的。

类似的例子,还见于《刘晔传》。《三国志·刘晔传》的末尾提及刘晔的后人:“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这样的记载和评价也是有依据的。裴注引“傅子曰”:

陶字季冶,善名称,有大辩。曹爽时为选部郎,邓颺之徒称之以为伊吕。当此之时,其人意陵青云,谓玄曰:“仲尼不圣。何以知其然?智者图国;天下群愚,如弄一丸于掌中,而不能得天下。”玄以其言大惑,不复详难也。谓之曰:“天下之质,变无常也。今见卿穷!”爽之败,退居里舍,乃谢其言之过。^②

这样的亲历见闻使人读来倍感真切。他与刘陶是同时代人,而从此处裴注引干宝《晋纪》所反映出的刘陶在晋初的下场看,傅玄对人物是有相当的鉴赏力的。同时此处几种史料的对比也使我们相信,陈寿的撰述应当参考了此类文献。

3. “傅子曰”中有完整详细的人物传记,为其他史书所借鉴。

最为典型的当是管宁的传记和郭嘉的传记。在《三国志·管宁传》注中,裴松之先后徵引了“傅子曰”共6处,联系到该传的徵引情况,主要是“傅子曰”和皇甫谧的《高士传》,我们有理由相信,陈寿撰写此传的主要史料依据即是这两种书。以下让我们分别对此二传予以分析。

在《管宁传》中陈寿写道:“管宁字幼安,北海朱虚人也。”裴注引“傅子曰”:
“齐相管仲之后也。昔田氏有齐而管氏去之,或适鲁,或适楚。汉兴有管少卿为燕令,始家朱虚,世有名节,九世而生宁。”^③两者相比较,显然“傅子曰”中的资料更为详尽完备,并与当时讲求追远溯始的传记记述手法相符合,而陈寿写传的文字则惊人的简洁,经过裴松之的补充,无形之中成了一种比较,二者的史源关系便更加鲜明了。

在陈寿接下来的记述中,提到管宁在汉末的大乱中与朋友来到了公孙度管辖的辽东,但他不是为了求官,尽管公孙度“虚馆以候之”,但他却“既往见度,乃庐于山谷”。随之又记述道:“时避难者多居郡南,而宁居北,示无迁志,后渐来从之。太祖为司空,辟宁,度子康绝命不宣。”裴注在这里既徵引了“傅

①《三国志》卷11《管宁传》附《胡昭传》裴注引,第363页。

②《三国志》卷14《刘晔传》裴注引,第449页。

③《三国志》卷11《管宁传》裴注引,第354页。

子曰”，又徵引了《高士传》，《高士传》在这里补充的是《管宁传》中没有的情节，即一些具体的事例说明管宁用高风亮德化俗一方。但所引的“傅子曰”却不相同，其内容在陈寿文中均可找到对应。例如，“傅子曰”作“还乃因山为庐，凿坏为室”，陈寿文作“既往见度，乃庐于山谷”；“傅子曰”作“越海避难者，皆来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陈寿文作“后渐来从之”；“傅子曰”言度子康有王霸之心，卑己崇礼，“欲官宁以自镇辅”，与陈寿文中“太祖为司空，辟宁，度子康绝命不宣”正相对应。这种一详一略、内容均有对应的文字叙述，人们是不难知道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

裴注在本传以下所引徵的“傅子曰”，更加表明在傅玄的笔下原是有一部较为完整的《管宁传》的。以下的“傅子曰”历叙公孙度死后其嫡子与其弟争位之事而管宁事先有预测并将家属迁走、管宁居辽东三十七年之后受徵归魏及其归途中惊险历程，也记述了管宁上书魏帝以疾辞官、司空陈群推荐管宁等。在陈寿记载管宁去世的最后段落中，陈寿补叙了管宁生前以曾子、王骏等贤人为榜样的情操要求。而在裴注引“傅子曰”中，也记述了管宁遵从圣人礼制，担心衰乱之世人们妄变氏族，特“著《氏姓论》以原本世系”。除此之外，对于邻里姻亲始终不忘以孝、悌、忠等观念影响之。这类以德化人细节的补充，与陈寿所记是一致的，同样也只是详略的不同。更为明确的是，“傅子曰”最后说道：“宁之亡，天下知与不知，闻之无不嗟叹。醇德之所感若此，不亦至乎！”^①这明确显示，傅玄的这段文字就是写在管宁传记的末尾的，我们可以清楚地领略到傅玄所写管宁传记的大致脉略，也能够理解他所写的管宁传记怎样与陈寿的《三国志》管宁本传符节相应了。

《三国志·郭嘉传》也是如此。该传中裴注引“傅子曰”共8处，并且其注释主要徵引的是“傅子曰”^②。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傅玄原写有较为完整的郭嘉传记，或与陈寿所写的传记并行流传，或被陈寿所写的传记所吸收。

在记述郭嘉生平时，陈寿从郭嘉“北见袁绍”说起，而“傅子曰”（第1处）从郭嘉“自弱冠匿名迹”说起，更具完整性。接着傅玄的文字（第2处）记载了郭嘉向曹操分析袁绍有“十败”而曹操有“十胜”的具体内容，体现了郭嘉“少有远量”的特性。在这些分析中，郭嘉特别提到袁绍的为人特点“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这与陈寿所写传记中郭嘉评论袁绍“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是一致的。此外，陈书中接下来就记载曹操征吕布的事，却没有丝毫的背景交代，而傅玄却在这次郭嘉与曹操的对话结尾处记述了郭嘉提议欲讨袁绍必须先取吕布的战略。相比之下，陈寿的记述缺少了这一环，就显得突兀。在攻打吕布取得阶段性的成果时，陈寿记述道：“时士卒疲倦，太祖欲引军还，嘉说

①《三国志》卷11《管宁传》裴注引，第360-361页。

②《三国志》卷14《郭嘉传》裴注引，第431-436页。

太祖急攻之，遂擒布。”而傅玄（第3处）则详细记录了郭嘉劝说曹操的细节，终于说动了曹操。如果说陈寿的记述有简约之美的话，傅玄的记述则有完整细密之长。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此处（第3处）郭嘉劝说之辞中引用了秦汉之际项羽的例子与吕布作对比，与上述（第2处）郭嘉与曹操对话时以刘邦、项羽的例子与曹操、袁绍作对比一样，一方面体现了郭嘉论证事情的风格，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两处“傅子曰”本具有内在的联系。在该传的末尾，陈寿记述赤壁之战失败后曹操感叹说：“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傅玄（第7处）则记载此时的曹操还深情地怀念道：“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更能反映出曹操暮年时的悲伤。最后，傅玄（第8处）摘录了曹操给荀彧的两封追念郭嘉的信，体现对这位英年早逝的知己刻骨铭心的思念。从陈寿在此传首所记可知，当年郭嘉之所以与曹操相知并为其所用，也是荀彧推荐的结果。这段佳话当为时人所共知，傅玄在传末的记述正好与传前相对应，体现其高超的撰述技巧。

4. “傅子曰”涉及吴蜀历史。

在现存有限的“傅子曰”的材料中，有少数评价吴主孙权的材料，有评价蜀国姜维的材料。我们不能肯定傅玄对吴国、蜀国历史有专门集中的记述，然而在记述魏史的过程中对此两国的历史有所涉及，应该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材料在现存的各种《傅子》辑本中，绝对找不到一点踪迹。这同样也是“傅子曰”为史书的一个佐证。

在涉及蜀国史的评论中，裴松之所引的“傅子曰”至少有三处材料值得注意。一处是记述刘备袭蜀之时，丞相掾赵戩对其“拙于用兵，每战则败”的消极评价和处士傅幹对刘备诸人的积极评价，傅幹的评价主要着眼于其群体：“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张飞、关羽勇而有义，皆万人之敌，而为之将；此三人者，皆人杰也。以备之略，三杰佐之，何为不济也？”^①另一处陈寿在《关羽传》中，记述了关羽向老友张辽表示绝不背叛刘备，但也要“立效以报曹公乃去”。张辽向曹操汇报了此事，“曹公义之”。这里裴注引“傅子曰”作：

辽欲白太祖，恐太祖杀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叹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度何时能去？”辽曰：“羽受公恩，必立效报公而后去也。”^②

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这段文字记载有明显的心理描写性质和故事的曲折性，不可能出现在政论性的著作《傅子》中。二是陈寿的文字和傅玄的文字间的关系，不是属于前后继承的关系，就是属于史料同源的关系。这从二者叙事的次序和遣词的相似可以看出。三是陈寿的这段文字记述在《蜀书》中，我

^①《三国志》卷32《先主传》裴注引，第883页。

^②《三国志》卷36《关羽传》，第940页。

们虽然不能判断傅玄的《魏书》有专门的记载蜀史的部分,但从实际情况看,傅玄当对蜀史予以了足够的重视。还有一处就是对姜维的评价,他认为:“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修布衣之业。”^①

在涉及到吴国史的记述中,陈寿记孙权去世,裴注引“傅子曰”。傅玄在文中回顾了孙策继承父业经过艰苦奋斗“尽有江南之地”后,接着即重点评述孙权:“及权继其业,有张子布以为腹心,有陆议、诸葛瑾、步骖以为股肱,有吕范、朱然以为爪牙,分任授职,乘间伺隙,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②这里对吴国人物的评论,无论是角度还是语气、句式,都与上引傅幹评论刘备相类似。这再一次说明,在傅玄的著史活动中至少对蜀史和吴史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总之,笔者通过上述考察所得出的结论是,《傅子》自是《傅子》,《魏书》自是《魏书》,《三国志注》中的“傅子曰”是傅玄未完稿的《魏书》中的一部分。同时,从书中所引徵的王沈《魏书》与“傅子曰”观点相异而又常出现在同一卷中的情况来看,傅玄的《魏书》不可能混入到王沈的《魏书》中。完整的记事和人物传记、成熟的叙事手法和史著模式、互见法的应用等,这些都不是政论性著作《傅子》所应该具有的特征,也不是《傅玄集》中的内容,只能是其史学著作《魏书》中的内容。

作者工作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①《三国志》卷44《姜维传》裴注引,第1063页。

②《三国志》卷47《吴主传》裴注引,第1149页。